

轶闻掌故

运盐河作“引擎”，
让明清两代的如皋腾飞

□彭伟

明清两代，如皋经济快速发展，后来留下“金如皋，银泰兴”的美谈。究其缘由，如皋实为“小扬州”，得益于产盐、运盐的便利。若将明清两代的如皋，视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其“GDP”=C(消费)+I(投资)+G(政府开销)+NX(出口—进口)。以此为线，以史为实，进行分析，可以获知运盐河正是拉动如皋“GDP”发展的重要“引擎”。

G取决于人数与收入。人数引来的消费增加至少有三处。1.灶丁(即烧盐工人)。明嘉靖《如皋县志·盐荚》记载：掘港场，原额户八百四十三、丁一千五百九十六；马塘场，原额户二百八十四、丁四百八十四；丰利场，原额户三百五十、丁五百六十。时至清中前期，乾隆《如皋县志·盐法志》记载：丰利场原额盐灶丁三千六十五丁，今新编灶丁烟户一千七百四十一户，共计六千六百九十七口。掘港场原额盐灶丁一千六百八十一丁，今新编灶丁烟户一千六百二十五户，共计八千五百七口。马塘场并石港场，原额盐灶丁六百二十三丁。运盐河周边的盐场，总是有一批固定的灶丁，尽管他们的收入低下，生活艰辛，但是人口基数大，仍有利于消费的增长。2.唐代日本僧人圆仁访华，在如皋境内运盐河畔见到：“盐官船积盐，或三四船，或四五船，双结续编，不绝数十里，乍见难记，甚为大奇。”因为需要运输，物流业快速发展，随之一批又一批船员、搬运工人须在如皋境内消费。3.富裕的盐商、盐官，人数少、收入高，直接有效地拉动消费。寓居如皋的清初文人余仪曾(冒襄好友)作有《如皋县三十四韵》，写下“侯鯖贾客船”“煎盐咸地脉”诸句。贾客船就是指如皋境内来来往往的盐商船只。蛙菜也罢，侯鯖也罢，当下说来，就是“海鲜大餐”，拉动消费的同时，还大大促进了地方饮食业的发展。

I取决于商人的投入。历代以来，如皋境内的运盐河经过多次疏浚。开挖或疏浚运河，实非易事，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人力。《东皋诗存》中就录有清人陆进(字宿凡)，于丙寅腊月写下《后浚河行》：讯知朝廷浚河急，耗费尽出商人力。商人射利收羨余，皇仁不贪多蓄积。皇恩仁德，朝廷果断，商人给力：往往由盐商出资，代替G(政府开销)，作为投资，疏浚运盐河。仅从

经济效益来看，盐商也愿意疏通运河，否则运盐停滞，何来收入？

G取决于T(税收)。税赋越多，国库充实，朝廷分配给地方的支出也就随之增加。如皋海盐源源不断地作为贡品，通过运盐河，送往国库。明嘉靖《如皋县志·盐荚》记载：掘港场，岁办(每年贡品)大引额盐一万五千九百五十九引(明代每大引为400斤)；马塘场，岁办大引额盐四千八百四十四引；丰利场，岁办大引额盐五千六百八十引。仅仅此三场，如皋一年就上贡国家海盐上千万斤。通过运盐河，如皋海盐源源不断创税，上缴国家。乾隆《如皋县志·盐法志》记载，丰利场，征课银约一千九百五十五两；掘港场，征课银约一千七百九两；马塘场并石港场，征课银约八百七十三两。不要小瞧如皋上缴的税收。清乾隆《如皋县志·河渠志》就有记载：

明弘治间，运史毕亨从葛欽议修之。欽议云：吴城邗沟，汉通江淮渠，唐始置堰，宋易以坝。况我朝都北，其财赋仰给东南，尤为要害。今湾头以东止一河而通泰、如皋、海门四州县富安等二十四盐场皆辐辏。

如皋等地上缴的盐业税赋，是明王朝不可或缺的经济命脉。

NX取决于出口增加，进口减少。产盐外销，就是出口创利。《嘉靖维扬志·盐政志》吴王渚立国广陵，召集亡命煮海为盐。盐所入辄以善价与民。此两淮盐利见于载籍之始。全国产盐(吴盐)看两淮(南北)，淮南产盐看如皋。乾隆《如皋县志·盐法志》记载：淮南产盐之场，凡三十，而皋居十之一，品得列上中。汉大农丞孔仅(财政家，盐铁商)所谓“山海天地之藏也”，其中就有如皋。吴盐历来视为好盐。如皋产盐，不仅有质，为吴盐中的“上中品”，而且产量不少。盐商汪之珩作诗《黄沙洋纪事》，记载丰利场产盐的盛景：“等高远极目，罗布瞻盐场。盐场三十六，高屯盈千仓。”此诗写实，并非斑语。《如皋历史文化》则记丰利场，明嘉靖三十年，年产盐一万二千四百一十引；清末民初，年产盐均约每年2万余桶(每桶200斤)。有质有量，确保出口增加。至于进口方面。乾隆《如皋县志·盐法志》记载，皋人煮盐而自食之，国家不设纲局，具有远见。即如皋人吃盐不用缴税，因此无需进口。

运盐河作“引擎”，拉动古邑如皋“GDP”快速腾飞。

通东乡间的“泥络担具”

□杨汉祥

时下说起乡间的“泥络担具”，即使许多出生在农村的年轻人都不知是何物，也难怪，他们不但没有看到过，而且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然而在过去，也就是三四十年前，在我们通东农村中十分普遍，凡是有男劳力家庭中，几乎家家户户都备有这种自制的担具。

所谓“泥络担具”，是我家乡通东一带启海人的称法，其实就是农村中一种挑担工具，比如过去开河用的都是人力，人们把河底挖出的泥块运送到河岸上或更远的地方，一般都用泥络担具挑着运送，当时人们称这类工种为挑泥。据说我们南通地区当年开挖通吕运河、九圩港河等大河时，民工们运泥除了用小推车推以及大箩筐抬外，大都是用就泥络担具挑着运走。至于农民逢到往田间运送河底淤泥或淤制的灰肥时，使用的也是这种泥络担具。

“泥络担具”是由泥络框架、麻绳、扁担所构成，制作时农民大都自己动手。麻绳、扁担一般都有现成的，泥络框架则另外制作。先挑选一根大概一米多长、粗细适中而富有弹性的毛竹片，将其两端都锯出凹口，再将一根五十多厘米长的毛竹片两端各凿一个方孔，然后把长毛竹片弯成半圆状，并把

其两端塞进短毛竹片的两个方孔中，当人的手松开时，长毛竹片由于有弹性而被牢牢地撑在短毛竹片的孔中，这样一个半圆形的框架就制成了。接着用稍细一点的麻绳绑在框架上并结成网络，最后剪三根稍粗一点约一米多长的麻绳，将其一端分别系在毛竹框架的三个点上，再把这三根麻绳的上端拢在一起，结成一个能穿插扁担头的绳套。这样一个泥络框架就做成了。平时使用时，而只要用两个泥络框以及一根扁担，就组成了一副“泥络担具”。

农民平时挑泥块时只要用这种带网络的担具就行了，因为泥块大，不会从泥络网眼中漏出来。而挑细碎的灰肥或其他细碎状的东西时，就要在泥络挑框框架上安放一只底部跟泥络框架面积一样大的竹编簸箕或芦席编的簸箕，然后用细麻绳与泥络框架绑牢，这样所挑的细灰状的东西就不会漏出来。当泥络担具内装满泥块或灰肥时，尽管都有百十斤左右，因为扁担是有弹性的，人担着行走时只要跟着扁担的弹性节奏，就不会很累的。

如今，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农业机械种类也越来越多，这种近乎原始的挑担工具也就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狼山圣母堂内景,1937年

南通老照片

海陵旧话

蔡嘉树其人(下)

□徐继康

蔡嘉树一共娶了三位妻子，生有八个儿子(谱中说七子)，除长子蔡瑚、次子失载、三子蔡珖出继外，还有蔡琇、蔡瑜、蔡琪、蔡理、蔡璨。幼子蔡璨出生于乾隆四十七年，是“一柱楼诗案”结束后的第四年，看来蔡嘉树的心情还不错。此外，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他的母亲叶氏以八十八岁高龄去世，江苏学政彭云瑞书“节孝流芳”以旌之，之前也曾为之书额“寿宇熙春”，虽然遭到乾隆皇帝的点名批评，但蔡嘉树的政治待遇并没有受到歧视。他还生有一个女儿，嫁给岔河镇的汤临。蔡女生有二子三女，其长子就是汤俊，历任户部郎中、衢州、梧州知府，金衢严道、署宁绍道台，赏戴花翎，钦加盐运使司盐运使等职，是清代皋东历史上地位最显赫的官员之一；小女儿嫁给了工部、兵部尚书王广荫之子王来泰。后来汤俊又娶了蔡嘉树六子蔡琪的女儿。蔡嘉树的重孙女中，有两个嫁给同治元年进士袁祖安，一个嫁给翰林院侍诏胡春堂。此外，与他家结亲的还有本场缪家、丰利刘家、双甸任家、李堡仲家等等，都是当地的名门大族。令人奇怪的是，自从“一柱楼诗案”之后，蔡嘉树这一房没有颓废，反而蒸蒸日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场面。当年他在皇帝“挟嫌出告，其心为私，而非为公，蔡嘉树原不能无罪”的严叱声中，怀揣朝廷“免其置议，即予省释”的判决书回到耕茶，面对家乡人奇怪的表情，他平静从容，一如往常。有些笑容的背后，是咬紧牙关的

灵魂。可以肯定，从那以后，春天只在日历上，他成了自己的囚徒。

蔡嘉树住在耕茶场治所之南十二里的蔡家楼，这里最是偏僻，居住在此，大有入山唯恐不深之意。因为子孙众多，他晚年为之析居，如长子蔡瑚就迁居到岔河镇，身边只留下四子蔡琇与六子蔡琪在老宅同住，这两个儿子都是继室缪氏生的。老大为原配张氏所生，而其余四子的生母为妾曹氏。蔡琇与蔡琪都很优秀。蔡琇号饮堂，幼而颖异，长而倜傥，好读书，有四方志，但考试不行，就纳粟捐了一个散爵，铨布政司理问。蔡琪号瑶圃，更是与众不同，用他小传里的话说，“少博学经史，偶饶权奇，有循吏才，不拘拘习举子业”，他喜欢诗词，从里中诗人缪梅麓游，与同场著名诗人于泗关系最好，经常一起唱和，诗名很盛。东台知县徐崇炯聘请他人幕，一千就是十二年。通州知州唐仲冕曾劝他出仕，他总是笑着以母亲年老而推辞。

叶文瀚在《记徐氏一柱楼诗狱始末》一文中说：

又闻阿侍卫未至时，夜深里巷中，火光炎炎烛天，盖藏书家聚其所有，付之一炬也。此后数十年中，父诏兄勉，斥文字为不详物，制艺外，无许涉猎及，因此而古籍销沉。所谓读书种子，皆章句儒生。风雅绝响者，近二百年焉。

在“避席畏闻文字狱”，整个耕茶文人都视文字为危险物时，谁能想到，蔡嘉树的儿子偏偏喜好吟风弄月，难道就不怕

有人也从中找出几句狂悖之处来？其实不仅仅是蔡琪，他的儿子蔡绍遵还著有一本《芝竹轩稿》。蔡琇、蔡瑜、蔡琪的后人中出了不少读书人，民国耕茶最出名的文人蔡观明就是蔡琇的玄孙。

长朴屋那块田地最终拿回来没有？朝廷档案与《耕茶蔡氏家谱》都没有交代。嘉庆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六十八岁的蔡嘉树终于闭上曾经沧海的眼睛而寿终正寝，被葬于蔡家庄。他的子孙后人中，也没有一个人安葬在长朴屋祖茔。

《耕茶蔡氏家谱》“族戒”第四条“戒斗狠”写道：“小忿不忍，忘身及亲；大怒弗惩，结冤貽祸；仇非君父，刃不居先；怨非弟昆，戈宜处后；逞一时血气，滋数世之患害，是斗狠所必致也。”作为第一个指出徐述夔“明朝期振翻，一举去清都”为违碍诗句的蔡嘉树，不可能读不懂这段话，只不过从小就操持家政的他太精明了。乾隆三十九年，乾隆曾经传谕全国，查缴违碍书籍，凡三年之内自首呈缴的，按律免罪。乾隆四十三年春天，蔡嘉树扬言“徐食田若不允赎田，将呈控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集》”，因为他早已算准，徐家已经失去了可以免罪的三年之期，他是吃定徐家的。谁知徐食田实在是个雏儿，根本没有掂量出对方话里的分量，凭着血气方刚，硬是把事件带偏出蔡嘉树所预设的轨道。

多少年后，他的重孙，也就是蔡观明的祖父蔡占先给自己取了一个斋名——“三让堂”，偕泰伯“三以天下让，先圣谓至德”之意，告诫自己与子孙，凡事好让不争，唯善是宝。其实又有谁知道，写下这一个“让”字，曾经经历了怎样的惊涛骇浪？